

尹卓校友访谈（1978级研究生）

受访者

1964年10月赴法国留学。1968年3月入伍，历任陆军第28军战士、班长、排长、连代指导员，军作训处参谋，海军东海舰队训练基地教研室主任，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情报室主任，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所长，海军装备研究院综合所所长、院科技委副主任。1964年至1968年，本科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格勒诺布尔大学。1978年9月至1981年2月，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1980年10月至1982年3月，于海军指挥学院合成指挥班毕业。1987年10月至1988年5月，赴大连水面舰艇学院进修。1988年8月至1989年12月，毕业于法国军事学院海军系、法国合成军高级班。曾任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博士后导师组组长，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采访者

姚艾

您在1964年就赴法留学，在1968年又入伍，那您当初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来到北外继续学习呢？

我到北外学习，是出于一些偶然因素。其实，我从小志向就是当兵，我的父母亲都是老一辈的革命军人。所以，去法国留学之前，我填报的志愿其实是哈尔滨军工。结果组织给我下达了出国的任务，也找我谈过几次话，因此最后就去了法国留学，但是我从军的梦想一直存在。

回国之后，正是“文革”时期，当时我们这些1968年的留学生不好分配，我就应征入伍当义务兵了。我觉得在基层部队工作很好，开始在陆军，后来被调到海军，都很顺利。在海军部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白专”道路，我受到了批判，最后我就想离开部队。

离开部队之后刚好“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研究生恢复招生，所以我说这也是个巧合。考试前两星期我决定报考研究生，因为之前在法国学习法国文学、地理、历史和国际法，最后就报考了北外法语系的研究生。研究生读完之后我又回部队了，因为部队找我谈话，还去学校找我，让我回去。我到北外学习是想改换门庭，脱离部队，但最后也没走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在法语系学习期间，有没有什么人或事给您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当时法语系的整体氛围是什么样呢？

谈到留下深刻印象，当然是法语系的同学了，我们同学感情都非常好。这些同学们都是社会的精英，所谓精英，并不是说在社会上地位如何高、如何出人头地、如何挣钱多，他们在“文革”前都是学校的尖子生。1964年，我高中时参加北京市的数学竞赛、物理竞赛，都获奖了，我学理工科就是想为国防科技做贡献。我的同学们都是各个学校的尖子生，他们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工作和学习。

人尽其才，学校就把这批人作为研究生招来了，这也是他们改变人生命运的机遇。所以那一届研究生可以说都是社会的精英，包括现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就是当时英语系的学生。大家学习成绩都很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炼和基层的锻炼，人生观世界观都很成熟，都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样的一批人被

招进学校当研究生，成为高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那时候招的研究生很成功。大家关系都很好，都经历过基层的锻炼，都在基层摸爬滚打过十年，所以惺惺相惜。

还有学校的老师也让我印象深刻，像我的班主任陈振尧老师，后来有一次他生病，我还去看过他。陈振尧老师对我们非常负责任，不但在学业上帮助我们，而且在生活上很关照我们。他在很多方面对我们进行指导，比如学习方法，分享学习体会，教我们如何处理与外教的关系，还教我们如何从外教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当时有3位外教教我们，中国老师教授的课程很少。老师还帮我们联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处，那里有一个大图书馆，我们每周都能去看法国电影，所以我们对陈振尧老师十分敬仰。古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正所谓师父，我们的确是把老师当作最尊敬的长辈来看待。

当时北外的学风很好，学习氛围特别好。在北外学习期间，没有学术造假之类的事情，大家都是实打实、非常公平地在竞争。大家也相互借鉴，交流经验，高年级给低年级的同学传授一些经验，不同院系的研究生也互相来往。整个学校的学风十分好，没有那么多功利主义。因为我们想的就是如何在学校这两三年抓紧学习，打好基础，今后能更多地做点事。

我们了解到您曾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军情连连看》的主持人，这档节目融知识性、专业性、趣味性、观赏性为一体，受众广泛。您是出于什么契机去参与到这档节目中的呢？节目非常成功，您知识丰富，思维敏捷，表达清晰、幽默，您是如何做到的？

这也是一些偶发事件引起的。1999年爆发科索沃战争，当时军事频道已经成立了，和农业频道合在一起。每天晚上都有新闻，并对科索沃战争的进程进行点评，比如双方战况如何，有什么下一步的行动，战果如何，战争向什么方向发展，对欧洲地区安全的影响等，对这些方面做一些分析。当时他们就找到了我，希望我来做一些点评，当时的上级领导也同意了。所以我就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每天晚上七点，在军事新闻里做大概20分钟的点评。科索沃战争持续了大概70多天，我当时就做了大概一个月的节目。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还给我们栏目组写了贺信，说这个节目影响很好，还写了一句致敬，对我们栏目组和几位点评嘉宾进行了表扬。这就是我第一次触“电”，当时还算是一个直播节目。

后来新闻频道的军事部要专门搞一档军事栏目，向军事爱好者讲国防知识。

因为之前的节目，大家就对我有印象，中央电视台对这个节目也很看重，就直接找到我，希望我来做嘉宾主持，跟主持人李文静搭档，这样就做了几年的《军情连连看》。以后就发展到军事频道、《今日关注》、中央13台的《环球视线》等等新闻性的直播节目，主要是看当天关于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军事演习的一些新闻，对国际上发生的大事进行讨论。中央电视台成立了军事频道之后，有两档节目，一个是《军事制高点》，另一个是《防务新观察》。我就以央视特约评论员和常备外宣专家的名义持续十几年在电视直播节目里完成组织上的外宣任务。

因为我在陆军待过，又在海军工作过几十年。陆军时的经历为我打下深厚的基础，我是从战士成长起来的，从战士、班长、排长到代指导员，这样一级一级提升起来，再到军处当参谋，然后再调到海军。基础的这一套我都熟悉，而且我对武器也很熟悉。另外部队经常搞演习，对陆军的装备，对装甲特性和如何反装甲都很清楚。后来到了研究机关，当时我被划分去搞装备研究，主要是对外国的装备、国防科技进行研究，那时候就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在海军指挥学院上学期间，我在合成指挥班学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有很多技术课，研究国防科技、军事装备以及装备的战术运用，我们从经典战术到合成战术一级一级地学，基础打得很牢。

在进行讲评、做节目的时候，我都是做自己业务范围之内的内容，当然驾轻就熟。而且我有一个原则，凡是不懂的，不是我专长领域的，我一律不涉及。千万不能当“万金油”，什么都去说一点，那样很容易犯错。要对观众负责，特别是要对外宣任务负责。因为军队有政治评价，这是一个政治纪律。胡说八道会误解观众，尤其是年轻学生。他们很多见了我，都说：“我从小都是看您的节目长大的。”那就说明我们当时做的节目还是有影响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这不是个人的事情，我也从来不把这些事当作出风头的事业，而是当成自己在完成党的外宣任务。

您出版了《现代美国海军》《世界舰船年鉴》《美国海军装备手册》《俄罗斯海军装备手册》《法国海军装备手册》等专著和工具书，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百余万字。您是如何完成知识积累的？您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可以举例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写这些书对我来说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写论文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写的论文都是内部机密，对世界形势的看法，那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在政

治大原则下，就有学术自由，可以尽情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

写书本身不困难，困难就在于如何既保持趣味性、可读性，同时又不涉密。有些书籍是公开出版物，要把一些保密的内容和一些敏感的学术观点抽掉。比如对美国的分析，对战争、地区形势的分析，跟邻国的关系，不能什么都往书上写，否则是容易犯错的。而且我们出版的书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审查，政治审查、保密审查。因为我从事的职业是涉密比较深的，一些内部重要的机密会议我都参加，但不能把这些东西往外写。显示自己知道得多，什么都往书里写，这就是犯错，所以保密是十分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些政治原则不能违反。

所以我是不是很愿意写书了。近来，约稿的非常多，但我不愿写了，因为（尺度）太难拿捏。我只写了几本公开出版物，现在国家给我的工资已经不低了，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不想通过写书来赚取稿费。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内部很多人都知道，包括我的领导、军委总部和海军的领导都知道，我没有必要再到社会上讲。但是去年我退休了，我准备写回忆录，已经写好初稿，还要慢慢再润色，可能还有些涉密的东西要删除。虽然是自己的自传，但工作生涯参加了很多有机密的工作，还有一些学术成果不能放在回忆录里，所以还是要慢慢斟酌。

北外是一所拥有红色基因的学校，请问您当年在北外求学的过程中，在这一点上有什么体会呢？

北外的办学宗旨是很明确的，因为一些优秀的学生都是要被外交部和一些其他外事部门挑去的，这些职位虽然不是特别需要保密的工作，但也是很敏感的。周总理讲“外交无小事”，周总理为什么对北外这么重视，就是因为北外是培养外事干部非常重要的学校，除了外交学院就是北外。外交学院是培养干部的地方，北外就是培养干部加专业干部。我们很多大使都是翻译出身的，北外校庆的时候有很多大使和领导参加。

北外有非常好的传统。首先，政治立场非常明确，在几次大的运动里，北外没有走错路，所以“文革”一结束我们就去北外上研究生。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肃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思想，我们北外师生对这点是非常坚定的，肃清一些极左的思想，尽快把大家的思维转到生产建设、提高科技水平、提高文化水平上来，尽量全国“热气腾腾”地搞建设，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另外，我们摒弃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平复“文革”的一些纷争，大家一心一意向前看。此外，我们学习期间，也非常关注时事，比如“文革”期间国际上的一些大事，国际安全的一些大事，我们都是实时跟踪的，因为今后要做外事干部，这些专业知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同学之间，我们的组织生活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的党组织关系都转到了学校。所以总体来讲，在北外，一个具有红色基因传统的学校，我们不但继承了北外的红色基因，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一代一代学生的入校离校，体现了我们北外的红色基因不断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使国家进入正常的经济发展轨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在北外学习期间，班风非常正，我们系的政治立场很坚定，而且风气很正，是紧跟党中央、紧跟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线的。

您求学、工作经历十分丰富，令人佩服，是什么驱使您一直努力学习、提升自己呢？

对我的人生来说，从小学、中学、出国留学、回国读研究生到军事院校的学习，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要有信仰。我的一生，说不上顺利，我也遭受了很多批判，但与此同时，这些批判又加深了我的信仰。因为从小我就向往当一个革命军人，做一个共产党员，一辈子就信仰马克思主义。

社会上有多种信仰，佛教、道教等，我觉得共产党员只需要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是真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判断国际上发生的事。共产党的信仰是自觉的，你觉得它科学，才会去信仰它。一旦有了这个信仰，就要为这个信仰而奋斗。我现在能对这个世界纷繁复杂的战略格局的变化、各个地区的战略形势作出分析判断，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犯过大的错误，分析判断都是符合实际的，甚至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经过时间的检验，这些判断都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分析判断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我去北外讲过课，我这些判断都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然还要自己结合实际去运用它，但基本原理是不会变化的。这种信仰对我的支撑是非常强烈的，并且有这样的支撑，我感觉心里特别有底，特别自豪，我信仰这个，我不会犯大错误，我还会跟着历史潮流一块走，我想这对我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加入共产党也有50多年了，我认为我这条道路选得非常正确。

您对如今法语学院的人才培养有什么建议?

人才培养的第一条就是德育，爱国是根本。我觉得在我学习期间，学校里的氛围是非常爱国的，我觉得这是北外非常好的传统。知识越强，学习越好的学生，如果德育上走错道路，对社会危害就会越大。所以首先是德育，爱国是根本。即使不入党，也要爱国，至少要做爱国知识分子。我想我们北外首先要做到，引领学生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热爱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因为爱国不是空的，爱国就要拥护社会主义。现在网上很容易出现一些其他观点，通过各种段子、小视频，西方不断给我们输入一些错误的思想，我们一定要抵制。

寄语

我希望法语学院能够继承和发扬北外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北外的红色基因，能够把北外打成一个最好的为国家培养外事干部的人才基地，同时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社会主义信仰的红色基地。